期待经典

◆ 马以鑫

在我的电脑桌面上,一直保存着以色列小提琴家伊扎克·帕尔曼演奏的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主题曲。经常是,在我即将开始一项新的工作,或者是结束了一件事,有时倦怠、有时踌躇,我都会用鼠标点击。倏忽间,那惆怅、怨愤、如泣如诉的小提琴声响起,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又一次走进那音乐里……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导演的《辛德勒的名单》以二战为内容,展现出辛德勒为保护备受摧残和蹂躏的犹太人,大义凛然、奋不顾身,而最终受到犹太人永久的怀念。约翰·威廉姆斯作曲的音乐,深刻而扣人心弦地表现出电影的主题,成为电影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多年来,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,而其中的音乐也已经成为小提琴演奏的重要代表作。

值得一提的还有罗曼?波兰斯基导演的电影《钢琴家》,也是二战内容,表现的是一位波兰犹太人钢琴家当时被迫害的故事,其中的音乐多采自于波兰钢琴作曲家肖邦的《小夜曲》。此情此景,更是让观众在银幕前受到冲击而百感交集。

我以为,这样的作品真正是堪称经典。何谓“经典”?《辞海》解释非常简洁明了:最重要的、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。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令人发指、罄竹难书,但是,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却表现出主人公一开始并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关爱,他想的是自己工厂不要关门。随着犹太人逐渐进入他的工厂,辛德勒亲眼目睹法西斯对他们的迫害,他开始关心犹太人的生存,终于竭尽全力,甚至不顾自己性命,全力保护犹太人而多达 1200 名!《钢琴家》源自于斯兹皮尔曼自传,讲述钢琴家因为是犹太人而险遭屠杀,但一位德国军官出自于对钢琴的喜爱,以及对肖邦《小夜曲》的钟情,而千方百计保护这位钢琴家。电影中一个镜头我至今难忘,那是东躲西藏的钢琴家一次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一架钢琴,他难以抑制地冲上前去,打开琴盖,兴奋地举起双手,刚要触碰琴键,顿时,他呆住了,因为他猛然意识到,这是什么时候?这是什么地方?于是,他只是在空中舞动双手,口中念念有词,此时,却传来了钢琴声……战后,钢琴家始终不能忘记那位曾经救过他的德国军官,而四处去寻找。

由此,我们可以发现,所谓经典,那是人物灵魂的展示,是灵魂的煎熬,是灵魂的拷问。同样,在电影《美丽人生》中,看似戏谑,父亲和儿子都被关进了犹太人集中营,但是,为了幼小的儿子,父亲总是说,这是一种“游戏”!目睹这样的画面,观众怎么抑制得住自己的眼泪?

围绕二战,欧美出现了大量经典作品。从文学上看,甚至还带来了文学创作手法的变革。约瑟夫·赫勒的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由此而开始“黑色幽默”。君特·格拉斯的《铁皮鼓》用象征和比喻、夸张,揭示当时德国人的心灵交织。即使是带有大众性、通俗性的赫尔曼·沃克的多部头长篇小说《战争与回忆》《战争风云》(后来均改编为电视连续剧),也受到读者的极大欢迎,并对所谓的严肃小说的创作带来不小的启示。

多年来,欧美有关二战的文艺作品,早已走过“纪实”、“事件”或者一般叙事阶段(其中也不乏经典,如《巴顿将军》《最长的一日》《珍珠港》等),而升华到对人精神层面的剖析,这样,就有了更为深广的意义和价值,因为由此我们不仅对过去的人有了更多的了解,更重要的是,我们可以从中对今天的人,包括对以后的人,有更好的觉察和认知。

在经典的作品中,我以为,文学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。我们熟悉的苏联电视连续剧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,源自于一部中篇小说。颇有影响的电影《黑皮书》《偷书贼》《朗读者》等,都改编于小说。电影的薄弱,首先是剧本的薄弱;而剧本的薄弱,还是因为文学的薄弱。在我们中国,也有过二战题材的好作品,例如,首先是莫言的中篇小说《红高粱》(后来成为长篇小说名为《红高粱家族》),接着是张艺谋导演的同名电影,而名声大噪,也可堪称经典。

可惜,这样的作品实在太少。我期待,有新的经典的出现。

我眼里的西藏神奇

◆ 柴俊勇

雪域高原上的西藏,既拥有富足厚重的文化资源,又坐拥旖旎迷人的自然景观,总有些挥之不去的神秘。那里的故事,也总是显得有些新奇和遥远。一直向往到西藏去一次,这次借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之际,我与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同志等一行前往西藏。短短的五天里,我看到了西藏的神奇,圆了梦。

西藏的文化都汇聚在寺院里,如布达拉宫、大昭寺等。日喀则萨迦寺有全世界寺院中绝无仅有的经书墙,距今已有 700 年历史,高 10 多米,长 80 多米,这些经书当时是怎么被放上去的,成了一个谜。书墙上,有时某本经书会凸出来,有时某本经书会凹进去,而且这些凸和凹都与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巧合,令我感慨。

西藏的人心态超常平静。从拉萨市到日喀则市的途中,一般开车时间要三个多小时,我们九点半从布达拉宫广场出发,沿着羊湖的岸边公路一直开,到十一点半的时候就堵车了,我们的面包车上有一张通行证,我们开上去一看,在警戒线的前面有一位警察和两位路政人员,他们说“前面公路在铺柏油,现在不通,要到下午一点开通”。我们车上的驾驶员是西藏本地人,他主动把车子退到最后面,几十辆车子在排队,没有一个人有怨言,没有人喧闹,也没有一辆车设法插队。下午一点半道路开通,先放行左边的车辆,我数了一下,正好 60 辆,然后再放我们这边的车。西藏的区政府所在地拉萨,拉表示佛,萨就是圣地,拉萨就是佛教圣地。圣地的人境界高,他们都把生死看得很淡。在西藏寺院拜佛时可以把两个大拇指放里面,两个拇指一个代表唯我独尊,一个代表自私贪婪,把手指放里面,就意味着没有争斗、和谐。

西藏的气象变化万千,随时会变,一会儿冷,一会儿热,一会儿天晴,一会儿下雨,就看头上的云。由于海拔高,云朵好像触手可及,非常神奇。西藏人的服装之所以那么独特,大概就是为了更好应对天气的骤变。

西藏的动物不怕车。牛猪狗马羊,有的在公路中间荡悠悠,有的躺在路上,汽车来了也不怕,按喇叭也不理,汽车驾驶员只能让开前行,可能由于长时间没有人去侵害它们,所以不怕是它们的基因。

海派平议

◆ 熊月之

所谓海派,就其表象而言,任伯年等人的写实通俗画,吴友如等人的社会风情画,郑曼陀、杭稚英等人的月份牌广告,刘海粟的率先使用人体模特儿,周信芳等人的改良京剧、连台本戏、机关布景,刘雪庵等人所作风靡一时的《何日君再来》《夜来香》等歌曲,《礼拜六》等报纸期刊连载的言情小说、黑幕小说,凸显女性曲线的旗袍,适应复杂人群口味的改良菜肴,表现形式各有不同,或为绘画、戏曲,或为音乐、文学,或为服饰、饮食,但都有以下四个共同点,即一是趋利性或商业性,二是世俗性或大众性,三是灵活性或多变性,四是开放性或世界性。其中,最根本的一点是趋利性,其他大众性、灵活性与开放性的基础仍是趋利。因为趋利,所以绘画要迎合普通买主的胃口,画通俗、写实的内容,画时装美女。因为趋利,所以要改良各地移到上海的菜肴,改造各地传入上海的戏曲,以适应来自五湖四海移民的需要。因为趋利,所以要写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小说、歌曲,要演有趣好看、吊人胃口的连台本戏,写跌宕起伏、引人入胜的连载小说。因为趋利,所以要不断花样翻新,不断追逐世界潮流,不断制造时尚。于是,美术、音乐、戏曲、小说等文学艺术不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文以载道的工具,同时也是一种商品,要适应市场、创造市场、扩大市场。

海派文化不限于上海,但以上海为早、为多、为甚。其原因有许多方面,包括城市体量大、人口多、西方影响广泛、租界存在等,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移民人口。

近代上海城市人口 85%以上来自全国各地,还有一部分来自外国。本地人口少,移民人口多,便使得本地文化对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排斥力、同化力不强,这为外来移民在上海立足、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。这一移民社会呈现高度的异质性、匿名性、流动性与密集性。在这里,传统熟人社会里士绅对人们的道德约束机制荡然无存,个人能力的释放获得空前的自由与巨大的空间。晚清竹枝词中有一句话,“一入夷场官不禁”,其实,不光是“官不禁”,民也不禁。于是,个人安身立命的资本便主要是能力而不是家世,维系人际关系的便主要是契约而不是人情。于是,重商、好学、竞争、灵活、多变、崇洋、“只重衣衫不重人”等与海派相关联的各种现象杂陈猬集。这在坚守耕读传家、重义轻利的人们眼里,便成了寡廉鲜耻、离经叛道、世风浇漓、人心不古。

当然,凡事都有度,走到极端,性质也就有所变化。片面强调重义轻利固然不好,而唯利是从则是另一个极端。贴近大众固然是好,但一味屈从、缺乏引导就流于媚俗。开风气之先固然是好,但一味赶时髦,就会流于多变无根。灵活多样固然对促进文化发展有益,但过度灵活多样,就变成流质善变。有学者曾提出将海派分为良性与恶性两类,其实两者的关系正如硬币的两面,很难截然分开。海派之被骂、被赞,根源都在于此。